

道通为一

——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特点

王蒙

“道通为一”这句话来自《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诡怪,道通为一。”意思是说,细小的草棍和一个大柱子,一个丑陋的人与美女,宽大的、畸变的、诡诈的、怪异的等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态,从道的意义上讲,都是相通而浑一的。与其他中国古代圣贤相比,庄子很强调“通”的概念,给人印象很深,颇值得思考。

我为何要找出这么一句话来谈呢?现在很强调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广泛了。我曾听过一件事,一批教授去访问美国,美国的听众问,你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以跟我们说说,怎么博大精深的吗?一位教授回答:博大精深,又博、又大、又精、又深,这怎么能说呢?这样的“不可说”未免令人哭笑不得。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爱好者,一直在思考,我们中华文化能否从整体上,从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概括一下?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谈传统文化?我抱着向读者求教的态度,来试着谈一谈。

中华文化的理想追求

首先,我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最突出的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礼记》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对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十分坚定。

中国古代的理想追求,还有一个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老子的话,但孔子其实也把无为而治看作一个很高的标准。《论语》快要结束的时候,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不就是舜吗?舜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端端正正坐在北面,向着太阳,各种事情就都有条理地展开。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百姓都非常自觉,一切行为都符合公德、符合他人利益、符合社会集体的利益,就好像一个人开车完全符合交通法

规,那他就根本不用考虑哪儿会有交警。而权力存在的最糟糕状态是什么呢?老子说,“其次,侮之”,就是权力和被权力管制的人之间相互轻蔑。所以,老子设想了这样一种理想状况:“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好了,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做的,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还有更深刻的一句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强调了权力的意图应与人民的意图保持一致。

尚德 尚善

中华文化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统一机制。比如治国平天下,依靠的是文化、道德、仁爱,实行的是仁政,道德上有示范作用,才能得民心、得天下。它号召用道德、仁爱、善良等等来治理国家。而人的道德与善良从何而来?《孟子》里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强调,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老子也说,“能婴儿乎?”这是老子对初心的提倡,要和婴儿一天天真无邪,善良纯真。古之圣贤认为,人性是善良的,都会自觉地不做危险的事情,所以执政也需要宣传仁爱的政策,才能得民心,而民心就是天道,符合民心,也就是符合了天道。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是一个笼统而复杂的存在,对于“天”这个概念,孔孟喜欢从道德伦理上总结,而老庄喜欢从哲学上总结。总的来说,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又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总括。天即道,道是没有名称的,既是本体,又是方法;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既是起源,又是归宿;既至大,又至小、至微、至精;既是正面的,又是反面的。所以天的概念,既是哲学的概念,又是道德的概念,还是通向信仰的准宗教概念。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就出现了一个景观,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了;把天性、人性、为政、道德、信仰、终极追寻统一起来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可以理解,中华文化很大的关键就是崇尚道德、崇尚性善,可以说这是一种理论,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仰。当然历史上也有“性善”与“性恶”的争论,但在事实上,性善的观念长久以来已经被老百姓所接受,已经深入世道人心,所以某种意义上,它从思想变成一种信仰,中华

不愿意。我也不理解,为此我们还发生过争论——在我看来,家里那点田地,扔了不足惜,父亲却看得比什么都重。

而当我重新回到稻田,重新洒下汗水劳作,重新耕耘与收获的时候,我与土地之间那种断裂的联系终于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一同建立起来的,还有我对父亲的理解。同时,我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在慢慢地发生改变。我不再认为城市是更好的生活地点,我也不再认为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比当农民更值得骄傲。因为“父亲的水稻田”这个“乡村实验项目”,许许多多的城市人来到我们家的水稻田。春天,大家挽起裤脚下田,一起插秧;秋天,大家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

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成年人都没有体验过。只有直接接触土地,才会深刻感受到劳作的辛苦、粮食的得之不易。种田似乎是一项“笨拙”的劳动。其实很多手工活计也都是如此,都是“笨拙”的劳动。一个绣娘可能要花两三年才能绣完一件作品;一个篾匠终其一生也做不了多少竹篮;一个农民,一辈子又能插多少秧呢?

这些劳动者,似乎赶不上这个时代的高速发展,但,这恰恰是我来做“父亲的水稻田”这件事的初衷所在。从春到秋,我想记录下水稻耕种的过程,我想体会父亲在劳作中的艰辛与汗水。我想把这样的劳作与耕种,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以及城市里的人们。

如果没有年轻人愿意继承父辈的种田手艺,那么再过十几年,当年老的农民们也不得不离开土地的时候,我们的水稻田也许将会荒芜,长满野草——这不会是我们想要的。时代终究会朝前发展,但劳作的意义永恒。

当我蹲在稻田中间,注视一株水稻的花时;当我趴在野草丛中,观察一只纤弱的豆娘一起落时;当我在稻禾中间汗落如雨,或当我品尝着自己劳作所获的大米时——我发现,生活本来如此简单而美好。

(本文为生活书店《草木光阴》一书自序,本报编发时有删改。)

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诉诸天良”。

尚一 尚同

中华文化还讲求尚一、尚同。现在世界上很难找出一种文化像中华文化这样,有这个概念——通了之后要同,同就是同,同就是通。道通为一,就是多种角度说来说去,其实是同一种道理。尚一、尚同是因为中华文化追求一元论,同时追求一与多的统一。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天下)定于一”,中国人还爱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看到了一,也看到了多,看到一与多的转换,强调掌握一以后,什么都解决了,所谓“一通百通”。

孟子认为,实行仁义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实行仁义并不像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艰难,实行仁义就好像为长者折枝,只要把树枝掰下来就可以了。到了王阳明那里,强调知行合一,认为只要安了好心,就可以干好事。而在孙中山那里,又强调“知难行易”,这是因为他看到,很多关键问题的解决,先是需要改变观念。有些外国人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背景,就会得出一些偏离实际的判断,比如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就比较低,他认为孔子说的事情都是常识以内的东西,甚至算是幼儿教育。但是黑格尔不知道,中国恰恰是把常识以内的事情看得很重,这也是化繁为简的思维方式。

中庸之道与穷通变化

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国家太大,治理需要依靠精英,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中庸”,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既不要过于峻急,也不要过于迟缓,应当恰到好处,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论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但他只是说“如浮云”,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在孟子的时代,认为精英就当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

有情与无情

——读赵丽宏小说新作《黑木头》

陈 逸



赵丽宏的新书《黑木头》(天天出版社出版),讲述一家人和一条流浪狗“黑木头”的故事。人和动物的关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现代都市人多有饲养宠物的经验,携带这样的经验来读《黑木头》,字里行间常令人心有戚戚焉。

我的祖母曾养过一只猫,是邻居抱来的一只普通的三花猫。猫抱来时断奶未久,野性难驯,时不时在家里闹点小祸。它唯独服帖祖母,因祖母每日管它吃喝拉撒,只要祖母喂嘴一唤,它就乖乖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十多年的光阴里,猫渐渐长大,变老,活力渐失,有一天家人发现,它肚子里生了一个肿瘤。我的伯父是外科医生,于是把猫带去他家,给它动了手术。手术后它元气大伤,成日恹恹的。伯父说,肿瘤没能割干净,估计撑不了多久。然而它还是一个一个月一个月地熬着。几个月后,伯父把祖母也接去他家小住,就在那一晚,猫盘在祖母的床头,断了气息。家人感慨,原来它是要熬到和老主人见最后一面啊。

众生有情,猫狗亦然。所以《黑木头》选择以一只“有情”之狗作为主角。但黑木头的出场,却是一副“无情”的面目,孤僻、警惕,对善意的人们充满戒心。小说随后揭示了这种“无情”的原因,因为它曾经受过人类的伤害。但同时,它那位逝去的老主人曾经予以它的温暖,又从未在它心中泯灭,当它

的,他强调有至人、有真人。

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化”的观点,《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事情碰到钉子,无计可施了,这就是“穷”,穷就要变,变了才有出路,才可维持下来。到了庄子的时代,更喜欢用的字是“化”——与时俱化。“化”与“变”相比,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一和同、天下定于一、吾道一以贯之,似乎很呆板。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我没有条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条件了,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充分理解战争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话,他早就灭亡了。

在中国,不同的思想理论可以想办法打通。老庄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坚强是死亡的特色。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但从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尔夫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这些人却说,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改革的就改革,化之于无形。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只有中国。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

如今,我们更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时势,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建设我们美好的生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大家读书

遇到童童的外婆,那似曾相识的老人的气息,又唤回了它的温暖记忆。如果说,那条名叫“黑木头”的流浪狗是小说的主角,那么另一个动人的形象,就是童童的外婆。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完美色彩,仿佛清澈的浅溪,唯独外婆的形象,如静水深流,复杂而真实。外婆和黑木头一样,也许都不是童话中惯见的那种一团和气的理想形象。她有偏执、不近人情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她渴望家人的关心,刀子嘴豆腐心,对弱小的动物充满关切与怜爱。我对当代儿童文学所读不多,印象所及,好像很少有作家会如此着力塑造一个老人的形象。也由此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儿童文学,到底要传达什么?

儿童本来是天真的、自我的、理想化的,如果儿童文学只是投其所好,向儿童复述一种天真简单、理想主义的世界,那和网络文学里颇受诟病的“爽文”,大概没什么区别。类似于你喜欢甜味,我就拼命给你吃糖,于是你对味觉的感受,永远只能停留在甜之一味中。好的儿童文学,我想,应该是给只吃过糖的孩子尝尝咸味、苦味、酸味,乃至种种复合的味道,让他们意识到,这才是生活的真相。儿童文学不是糊弄小孩子,不是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而是要让他们能够感知复杂,理解他人,学会迈出自己的小宇宙。和一切文学作品的标准一样,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应该是丰富的,多义的,可以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去的。

洋葱剥到最后,总会令人流泪。黑木头的结局是惨烈的,这不是一个有着快乐结局的童话故事,看似“无情”,实则却是真正的“情”之所在。作者在后记中说,对于这个结尾,也曾思虑再三,但“世上的事常常不完美,而不完美的结局中,也会孕育新的希望”。不免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取回真经本是功德圆满,不料遭遇最后一难经书破损,孙悟空也曾笑说“盖天地不全,这经原是全的,今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岂人力所能与”。

经过6年的采访、整理、编辑工作,《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终于出版了。这本书记录了谢辰生先生在漫长岁月中守护祖国文物七十载的亲身经历,以及从实践中摸索得来的精深识见,承载着谢老对年轻一代文物工作者的谆谆嘱托。

萌生为谢老整理口述历史的想法,最早是在2010年6月。那年的“文化遗产日”,我应邀参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表彰活动。主办方要我在会上作一个“公众参与如何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发言。发言稿写好后,我请谢辰生先生过目,他指出:“你的观点很好,但不能认为公众参与保护是21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实际上,早在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就提出发挥广大群众所固有的保护乡土文物的积极性。这个文件就是我执笔起草的。”

这个文件,我过去闻所未闻。谢老向我详细讲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物保护的若干重大事件,当晚,我就将先生的口述整理成文,并请他审定,作为研究资料保存。此后,因博士论文研究需要,我经常向先生请教,并留下了一批访谈记录,成为这本口述史的最初资料。

2011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到南大工作,中国的文物政策是研究兴趣之一,而要研究理论可以想办法打通。老庄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坚强是死亡的特色。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但从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尔夫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这些人却说,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改革的就改革,化之于无形。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只有中国。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

在征得同意后,从2012年到2015年,我先后8次赴京,在安贞里的先生家中对谢老进行20多次访谈,并辅之大量电话采访。接受访谈之前,他都要做充分准备,每次口述通常围绕一两个专题展开,持续一小时左右,一气呵成。先生已90多岁高龄,但思路清晰,回忆极有条理,时间、人物均相当准确,令我叹服不已。访谈基本完成后,我从2015年5月起进入整理阶段。2016年8月,我赴哈佛大学社担任访问学者,有了更集中的时间全力以赴完成这项工作。在成书前的半年时间里,我又通过数十次越洋电话对先生进行补充采访,谢老均不厌其烦,详加介绍。

谢辰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许多重大决策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也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位功臣。上世纪50年代,他执笔起草文化部报请国务院建议保护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的报告。1967年,他呼吁保护文物,并执笔起草中共中央保护文物图书的文件,在当时的环境中,为保护文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还能看到观象台,但背后的故事许多人并不知道。上世纪60年代,北京准备兴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即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正好要穿过观象台底下,施工单位准备把观象台拆卸移放到他处保存。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是何等的大事,施工单位也已经考虑到把观象台异地保存,一般人就不便再提什么意见了。谢老和罗哲文先生想去,最后还是给周恩来总理上书,希望这座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保持连续观测记录最悠久的明清两代国家天文台能够原址保护。周总理看后,决定地铁在这里绕道过去,还亲自批了绕道所需的经费。

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的起草过程中,谢辰生坚持体现“加强文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发挥文物作用的前提”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他发起保护三峡文物的政协联名提案,加快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通过和实施。进入新世纪以来,他老当益壮,老而弥坚,倡议推动了2006年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诞生,国务院就此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他在促进南京古城保护工作的同时,也促成了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使得古城保护实现了有法可依。正是因为他锲而不舍的坚持,北京、南京等古都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旧城整体保护”“鼓励居民按照保护规划自我保护修缮”等重要原则,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和文化街区得以保存。

谢老在讲述中多次嘱咐我,务必要讲清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十六字方针的内涵。加强文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发挥文物作用的前提。谢老认为“离开了保护就不可能发挥文物的作用”这一重要原则,是近70年来我国文物工作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理念,其正确性已经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应当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还要特别强调的是,谢老在回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从不因人废事、因人废言,多次嘱咐我在整理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谢老说:“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他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识见,是我国文物工作的重要财富。这份口述史,不仅是一个人的文物保护史,也是他与郑振铎、王冶秋、任质斌、梁思成、夏鼐、谢稚柳、郑孝燮、宿白、徐莘芳、罗哲文、张忠培等一大批先生们共同守护文化遗产的记录。

2017年3月书稿初步完成后,88岁高龄的金冲及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在郑振铎、王冶秋两位前辈之后,人们称辰生同志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当之无愧。”在整理过程中,我按谢辰生先生提示,查阅了《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谢辰生文博文集》《文物博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郑振铎文博文集》《王冶秋文博文集》等相关资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找到了不少罕见资料,如1954年由先生负责编印出版的珂罗版《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根据这些文献资料,我在书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注释,以助读者理解。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谢辰生先生曾引孟浩然这两句诗撰文疾呼:“守护民族文化精髓,为江山、为后人留得胜迹在,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进程中必须迈好的重要一步。”相信谢辰生先生为之奋斗的中国文物事业必将薪火相传。

(《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谢辰生口述、姚运撰写,三联书店出版。)

——《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整理记

姚运

守护祖国文物七十载

读书